

《野猪渡河》中的华人生存叙事探析

王樑稳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4年2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4年4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4年4月28日

摘要

作为马华文学代表作家, 张贵兴执著于书写婆罗洲华人的集体记忆与在地文化。他出版于2018年的《野猪渡河》是婆罗洲华人抗战史书写的一次突破, 小说描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建构起华人在抗日战争前后的生存记忆。从英属殖民时期多元族群中的排他性生存, 到日据“三年零八个月”的抗争性生存, 再到宏观视野下的融合性生存, 华人的生存叙事经历了形成、崩溃、重构的历程, 展现了华人主体与在地文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建构出婆罗洲华人历史性的族群生存寓言。

关键词

张贵兴, 《野猪渡河》, 马华文学, 生存叙事

An Analysis of Chinese Survival Narratives in “Wild Boars Crossing the River”

Liangwen W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Feb. 27th, 2024; accepted: Apr. 18th, 2024; published: Apr. 28th, 2024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Zhang Guixing is dedicated to wri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loc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in Borneo. His “Wild Boars Crossing the River” published in 2018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in Borneo. The novel uses a literary narrative to construct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survival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exclusive survival among diverse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to struggling survival during the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to integrated survival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survival narrative has experienced formation,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shows the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ubjects and the local civilization, and constructs a historical ethnic survival fable of the Chinese in Borneo.

Keywords

Zhang Guixing, "Wild Boars Crossing the River",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urvival Narrativ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张贵兴生于 1956 年，是第二代马来华人，他的身上没有父辈拓荒的历史记忆与难舍的唐山情结，却有一种严峻的“失根”焦虑。和第一代婆罗洲华人通过固守中国性来获得自我身份不同，成长于战后社会权力格局和政治关系激变背景下的第二代华人，不可避免产生了“我是谁”的主体建构危机。于他们而言，“中国”只是父辈遥远、模糊的记忆，“马来西亚”也被指认为一个陌生的新生政权，殖民者的离去以及马来族群的政治跃升，对在地华人的身份认同、政治归属乃至生存方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无法明晰历史，也便无法拥有未来，这是一个主体性的建构需求。因而，张贵兴这一代作家，面对双重边缘的处境，只能以写作的方式在记忆中赎回自己的婆罗洲原乡，《猴杯》书写拓荒往事，《群象》记述砂共斗争，而 2018 年问世的《野猪渡河》则更像是一则承上启下的华人“过渡史”，直面日军入侵的血色历史，铺展华人顽强生存的寓言。小说以非线性结构组织叙事，却始终围绕日据“三年八个月”的前后三个时期书写华人生存的历史，如黄锦树所言：“所谓历史，其实并不等于集体对于过往的认知或印象，它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给予，而是一种主动选择、接受、发掘、考察、建构、诠释的产物” [1]，张贵兴的雨林书写，不止是私人的记忆库存，更是婆罗洲华人的秘史踪迹。

2. 多元、混杂中的排他与固守

如同大多数马华文学作品，《野猪渡河》也塑造了一个丛林掩映、残阳如血的南洋异域。砂拉越地区的历史充满压迫的血色，在白人布洛克王国治下，砂拉越最大的特征就是混杂。殖民时期的砂拉越社会权力结构再清楚不过，顶层的欧洲白人掌握政权，中层的马来人充当“中间阶层”，而占大多数的底层的华人、印尼劳工、日本南洋姐及土著居民处于失语状态，《面具》一章开头，不厌其烦地论述时间，从“公元纪年”到“白人布洛克王朝纪年”，华人的历史是失语的，它的时间“可以被其他各种纪元所定义，唯独缺失了婆罗洲的声音” [2]。

所谓“族群”，指的是“由共同语言、宗教、信仰、习俗、世系、种族、历史和地域等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群体” [3]，它的外延更为广泛，因而以“族群”介入《野猪渡河》的论述更为合适。在前殖民时代，畸形的社会权力格局带来的是多元族群的“非和谐”共处，华人开埠的猪芭村是主要的叙事空间，华人的主体是以排他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南洋叙事中，对“异族”的恐惧如同历史魅影，背后折射的便是一种确立身份的需要。在这个文本中，中国性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民身份，更多是作为“海外华人的集体记忆和关于中国的文化想象” [2] 存在，因而“‘华人’不仅是一个族群、族性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心理概念。” [4]

王德威将“华文文学现象”译作“华夷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之别”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是中国人通过对异族“他者化”进而确立自我主体的生存策略，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化、婚恋选择和群体性行为三个方面。猪芭村华人虽然来自天南海北，所操语言千奇百怪，可是彼此之间交流却畅通无阻，闽南语族群、粤语族群、客家话族群与潮州话族群之上仍然有一个维系共同体想象的华语，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又是维系一个民族的重要纽带”([5], p. 207)。华人们在语言上确认了自己非印尼人，非马来人，亦非白人的中国性身份。华文教师萧先生这一形象的象征意味极浓，他们往往被定位为中华文化的“看门人”，萧先生向猪芭村的孩童们传授华语，讲习《封神榜》《西游记》在内的中华文化经典，事实上是以文化姿态固守华人的共同体想象，他编写的《齐天大圣》试图以孙悟空的故事重振乾坤，在中华文化的内部想象中延续血脉，然而这种尝试很快被“史朵克”的炸弹击碎，是华人艰难生存之缩写。

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华人的婚恋叙事，与李永平《拉子妇》中所呈现的对混血的恐惧类似，文化之外的身体血脉同样是华人们固守的阵地，这是文化记忆中的“身体化”倾向。华人社会的排他性在婚恋叙事中最为典型，因为日军的入侵，华人女性纷纷婚配，无一例外都在华人族群内部择偶。事实上，《野猪渡河》的写作缘由正是张贵兴父亲在日据前的“婚恋大潮”中的往事。何芸这个角色身上有极强的悲剧色彩，她因为脸上的胎疤，而无从择偶，便向关亚凤求爱，“我不想把第一次给番人”([6], p. 78)的自述不仅仅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更是潜意识里对于融入在地、去主体化的深深排斥。对于华人而言，主体的建构必须经由文化与身体的纯洁，即完全的中国化。

中国文化长期建立在“推己及人”的集体主义基础上，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在群体性行为中得以实现。早期的南洋华人延续着对中国本土的政治参与，华侨捐款抗战，华工回国参战，都是这种政治参与的体现。在殖民时期，砂拉越的政治格局相对松散，英属政府的治权相当有限，因此砂拉越的各个族群常常是以相互自治、彼此排斥的方式共存。在《黑环》一章中，因为爪哇劳工对华人神父养女爱蜜莉的骚扰，一场华人与爪哇人的大战随即爆发，而种族械斗的由头正是猪芭华人领袖朱大帝的那句“我们猪芭村闹瘟疫时，她和猪芭人一样，捐了钱盖福德正神大伯公庙”([6], p. 84)，这种话颇可玩味，即使爱蜜莉不被确认为猪芭人，甚至不一定是华人，但是她与华人们生活在一块，并且遵循华人的文化宗族法则，因而也便被视作华人共同体的一员。同时，华人与爪哇人的械斗还集中折射了一种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情结。第一代华人事实上并不将自己寄身的砂拉越视作家园，因此小说中的主线之一便是猪芭村华人“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运动，在这些情节里，出现了诸多政治意象，这种政治参与的方式不仅仅是固守自己的中国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中国想象，在猪芭村华人看来，“中国”是他们用以确立主体的唯一概念，“与其说是政治实体，不如说是文化图腾”[7]。

然而，这种本质化的自我身份想象，却始终面临着在地多元文化无可避免的混杂现实的挑战。即使是华人族群内部都无法统一，客家对襟衫、马来帕朗刀、从英国人手里买来的猎枪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猪芭村内外随处可见的日本南洋姐、爪哇工人、荷兰或英国白人无不佐证了霍米·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论，换言之，这是一个“殖民者/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8]，在这里华人始终处于间隙生存状态之中，是自由的，也是边缘的，最开始的生存模式只能是在一种多元、混杂的空间以排他和固守来延续中国性的策略，然而战争的到来客观上冲散了华人社群的“单一”状态。

3. 生存危机中的抗争与重构

日军的入侵是秩序崩溃的开始，是对砂拉越华人生活方式的不可逆冲击，但同时也是新的历史主体和文化身份重构的开始。在日军击溃了守土的英国驻军之后，砂拉越的社会权力结构看似只是更换了顶层力量，实则是结构性的彻底改变。华人所面对的生存危机十分严峻，尽管已经不在“那乡”，然而他

们的“中国身份”以及参与中国抗战的事实行为仍然成为日军迫害他们的理由。

日军对猪芭村发动的大屠杀，成为华人抗争的直接原因，甚至掩盖了远在中国的国族仇恨。在对抗日寇的过程，“家园意识”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战争重构了猪芭华人与婆罗洲的在地关系，从一开始的“寄身之地”到后来的“葬身之地”，日军的入侵使得这些华人的集体性记忆永远与婆罗洲的苦难历史相联系。从以南洋华人身份捐助中国抗战，到以猪芭人身份保卫猪芭土地，朱大帝、钟老怪等人组织的抗战游击，与其说是被远在千里外祖国大陆的国仇家恨驱使下的中国人在域外的抗战，不如说只是华人们为了保卫生养自己的猪芭土地而奋起反抗，如同原住民反抗入侵者。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华人们暂时放下了排他的文化固守，于是出现了华人与原住民族群联手抗日的景观，在一片血色迷蒙的腥红天地中，华人与达雅克人、伊班人融为一体，都被指认为婆罗洲普遍的生灵，身份的瓦解带来的是身份的重构，从华人到猪芭人，所变化的不仅是一个名头，更是在血与火的苦难记忆背后的在地历史经验，在经历了日军入侵以及白人殖民者的逃离，“猪芭村的这些华人的命运早已跟这片土地密不可分，个体所争取的是在地的生存权力”[2]，华人们奋起反抗，即是以一种历史主体的姿态真正走入砂拉越的历史，这里的生存必须经由斗争，而斗争意味着牺牲，牺牲则会带来永恒的历史记忆与共同的苦难想象。

张贵兴对于南洋华人的抗战史的发掘意义非凡，这是对固有的“离散”和“认同”等老生常谈的海外华人经验外的新的论述，这种特殊的抗争经验，将成为马来华人在文化身份论述之外，对自身主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经验，因而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质，“张贵兴的创作超越了华人世界各自纠缠的不同具体问题，实现了面对苦难与杀戮的相通体验的‘神话叙述’”[9]，华人们在反抗压迫中重构主体，进而得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白孩这个形象，他本是华人，在日军入侵后，全家遭遇屠杀，姐姐何芸更是被强征为“慰安妇”，自此白孩形迹放荡，宛如野人，没有人识得他的名字，他“被亚凤从猪芭村带到此地后像哑巴，从早到晚苦练吹箭”([6], p. 279)，处于失语状态下的白孩遵循着原住民式的暴力行为，他事实上是日据时期华人们的一个缩影。因为失去了家庭，白孩由此成为了一个游荡在猪芭土地上的魅影。他由于父亲死于爱蜜莉的告密，而一直重复着父亲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猪芭人出卖我们了”([6], p. 188)，这表示砂拉越华人之间的身份确认也走向了一种地域性而非文化性的指认，这都是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新变。日军的入侵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危机，白人殖民者的剥削、本土族群的袭扰以及以野猪为代表的自然问题，都能以华人内部的团结无二来抵御，然而日军的入侵使得整个砂拉越陷落，华人的力量不足以独自抗争，于是必须寻求新的生存方式，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命力的主体。帕朗刀是一个十分显眼的意象，这种武器天然指向暴力，也指向斗争，它“是婆罗洲原住民生活基本工具，也是对付白人殖民者和日寇的战斗神器”([6], p. 27)，它不止在婆罗洲原住民的手上大逞威风，也在华人的手上保家卫国，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即隐喻着斗争中的生存将是斗争而非妥协。

日军有意识地将华人与马来人等地族群区隔开来，为的就是扼杀华夷联合的可能。《野猪渡河》中的暴力书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大开杀戒”，《庞蒂亚娜》和《断臂》二章几乎如同人间魔域，群魔狂舞、暗无天日，日据历史好似在一片猩红的血色中颠倒阴阳。日军对华人发动的三次大屠杀，不间断的折磨，致使华人们忍无可忍，面对灭种的生存危机，奋起反抗，以至于寻求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相联合，在一定程度上舍弃过去旧的主体，寻求新的、婆罗洲本位的主体。血的记忆叠加国仇家恨，在苦难的日据“三年八个月”的历史中，“华人移民普遍从‘侨民意识’转化为‘当家作主’”([5], p. 35)，这些砂拉越华人的血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于是也就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猪芭人，成为了永远无法离开这片土地的婆罗洲人。

因为战争而加速的主体重构，注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尽管多元混杂的主体在渐渐形成，可是自

居四海归一的“华族”面对过去自己所鄙夷的沐猴而冠的“夷人”，无论是从文化心理还是从血缘身份上，华人与在地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壁障，于是《野猪渡河》的潜文本便是呈现这样一种不愿融入却又渴望和解的华人与在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4. 走向雨林的融合与迷失

张贵兴以“雨林美学”闻名文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的兽化与雨林的情欲化，其本质上建立在一种跨越地域或文化的人类共同体的视野。《野猪渡河》直接书写日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暴行，为的就是唤起华人共同的伤痛记忆和经验，直面共同的被压迫的历史阴影，换言之，就是走向雨林。

《野猪渡河》展现了华人们“从单质和边缘走向杂合多元的新的文化环境”[10]的历程，婆罗洲不再是异域，而是新的“家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11]。《野猪渡河》集中呈现了猪芭村华人们生存中的身份重构，它伴随着殖民掠夺、拓荒斗争、抵御外侮，并最终走向融合，同时又是处于迷失之中。

张贵兴自述道：“那个素未谋面的广东自然不是我的故乡，我住了超过十九年的台湾也不是，当然就只能那个赤道下的热带岛屿了”[12]。对于张贵兴这一代马来华人而言，故乡与原乡的问题是一个不能避免的灵魂叩问，唯一可以容纳他的乡愁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只有如今已是“异乡”的婆罗洲。砂拉越的历史十分复杂，它先后经历白人布洛克王朝的殖民统治和日军的入侵，最后却又被强行归入一个新生的陌生的马来西亚联邦。这对于已经形成本土意识的砂拉越华人而言，是历史性的创伤。白人的殖民统治在《野猪渡河》中并未过多论述，英国人的殖民只是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存在，猪芭村的历史主体自始至终都是华人，但其实，婆罗洲“华夷无间”的多元族群主体生存状态，正是从白人殖民秩序的崩溃中生发出来，经由日据时期，真正得以确立，始终维持着“生产”。

事实上，猪芭村早已融入在地，融入自然，它的景观是服从于砂拉越历史进程的安排的。《野猪渡河》有一股纯粹的自然主义风格，残酷到无以复加，这里的人们，生生死死宛如草木虫兽枯荣无常，杀戮生育宛如风霜雨雪不请自来，极具史诗气魄。张贵兴以华丽而冷静的修辞写着最自然的生存景观。人与野兽争夺生存空间、华人与印尼人族群械斗、猪芭人抵抗日军入侵，底层逻辑都不过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些旺盛的生命力与极致的动物野性相互交织，人和动物最终合为一体，就像红脸关对关亚凤的教导：“让自己的血肉流浚天地，让自己和野猪合为一体，野猪就无所遁形了”([6], p. 29)，在这个意义上，“野猪渡河”是一个隐喻，一则生存寓言。

在婆罗洲这个场域内，为了生存，融合是无法避免的。小说中的人身上有一种不加修饰的动物性，不管是嗜血的本能，还是极端的生殖崇拜。在这种残忍的自然主义的支配下，强者将弱者视作动物，日本人将华人视作动物、男人将女人视作动物，杀戮与暴虐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内在展演。对于猪芭村的人们而言，白人也好、日军也罢，都如同猎头的土著、袭扰村庄的野猪、伏在河底等待猎物的鳄鱼，似乎都不过是自然世界的应有之物。与动物缠斗、与自然斗争，终会成为动物、融入自然。事实上，华人也正是因为适应了雨林的生存法则，才可以抗击日寇入侵。更吊诡的是，不止是华人，白人和日本人在雨林中生存，久而久之也出现了兽化的倾向，《玩具》一章写白人布洛克伤痛幻想，帽子化作草龟、鱼狗啄食胸膛、狐狸哀怨凝视；《吉野的镜子》一章写日军首领吉野揽镜自视，“看见一只巨龟镜中，伸出数十颗龟头看着自己”([6], p. 213)，这些兽化描写，既是殖民者与入侵者内心兽欲的具象化，也是婆罗洲雨林的生存法则展演。

在这个层面上看，华人的生存模式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就是向着既定的轨迹运行，除了与在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别无二选。猪芭人两次“抗击野猪”，防范“飞天人头”，猎杀日军，以及融入原住民的白孩形象，都证实着华人走向在地文明、放弃单一主体的姿态。朱大帝与猪王的斗争，与其说是人与

兽的搏斗，不如说是争抢这片土地最高归属权的争斗，他的那句“等我杀了那头猪王就隐居山林，每年七八月，你可以找我伏击野猪渡河” ([6], p. 358)，就像是一头猪王对另一头猪王的宣战，那只黑暗密林深处的猪王，其实就是华人融入婆罗洲的内在演化。渡河本身是一种生命突破禁锢的方式，华人的生存并不只是反压迫，也缠绕着欲望与堕落，更加难以摆脱的是迷失的困惑。

和传统的海外华人将中国作为唯一的精神原乡与文化认同主体不同，张贵兴这一代华人所面临的是新的原乡定位。为了缓解失根的焦虑，离开生身之地的马华作家就开始书写自己真正的“第一故乡”，将南洋的历史经验内化为个人生命的文化、原乡经验。也正因为婆罗洲华人的边缘地位，他们拥有更多的生存与历史建构的可能，张贵兴以文学的方式重现故土，缓解焦虑，在小说中重塑记忆，而非重塑历史，目的是为了在记忆中将故乡赎回。这种找寻注定是悲凉的，正如关亚凤对爱蜜莉的寻找无疾而终，他亦自缢而死，似乎暗示着离开故土的马来华人终将流浪于历史之中，张贵兴个人的记忆书写，即是砂拉越华人的集体记忆展现。

5. 结语

人的生存不可绕开的问题就是对根的找寻。《野猪渡河》作为一部书写域外华人抗战史的作品，注定不能以纯粹的中国性立场来审视南洋华人的生存经验，它必须从在地的华人主体出发。诚然，华人们在婆罗洲的拓荒史是一部交缠着疼痛、苦难、罪恶与杀戮的历史。从最开始被迫处于多元混杂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借由固守中华文化和政治参与来排斥在地性，从而确立单一主体；到日军的入侵破坏了权力格局，为了求生，必须奋起联合异族斗争，在崩溃中重构主体；再到渐渐走向在地化，华夷无间的生存方式成为唯一的可能，多元主体的到来不可避免。作为一名背井离乡的马华作家，张贵兴在《野猪渡河》中试图重塑主体想象，建构华人生存的诗学寓言，以此赎回原乡，然而伴随着这种找寻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失根”焦虑与历史迷失。

参考文献

- [1] 黄锦树. 马华文学与中国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12: 307.
- [2] 彭贵昌. 雨林抗日传奇中的主体性建构——论张贵兴长篇小说《野猪渡河》[J]. 华文文学, 2022(1): 73-80.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749.
- [4] 沈庆利. 论“跨境华文文学”的提出[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5(8): 1-8.
- [5] 温明明. 离境与跨界: 在台马华文学研究: 1963-2013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6] 张贵兴. 野猪渡河[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 [7] 王德威. 后移民写作[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7: 245.
- [8] 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09.
- [9] 黄育聪. 华人抗日史书写与“雨林美学”新变——论张贵兴长篇小说《野猪渡河》[J]. 华文文学, 2022(1): 65-72.
- [10] 高志栋. 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3(9): 251-260.
- [11] 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208.
- [12] 张贵兴. 顽皮家族[M]. 台北: 联合文学出版社, 1996: 4.
- [13]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48.